

※ 學術會議 ※

「經學之傳承與開拓」國際學術會議 報導

蕭欣浩*

一、會議簡介

二〇〇九年，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與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合辦香港首次經學學術研討會，得多位經學權威出席與各地的學者支持，為香港經學的發展奠下新的里程碑。相隔五年，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舉辦「經學之傳承與開拓」國際學術會議，於二〇一四年三月七至八日假嶺南大學召開，與會學者來自中國內地、臺灣、澳門和香港，共發表論文三十四篇。是次「經學之傳承與開拓」國際學術會議連同暨辦的「聲音與意義——古典詩歌新探」國際研討會，為《嶺南學報》復刊的第二次學術會議。嶺南大學中文系為復刊《嶺南學報》舉辦一系列學術研討會，首次會議「嶺南大學漢學國際研討會暨《嶺南學報》復刊工作會議」已於二〇一三年十一月順利舉行，得多方學者支持，成果豐碩。

二、會議論文總覽

第一場

第一組	第二組
主持人：李雄溪（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	主持人：彭林（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

* 蕭欣浩，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講師。

林慶彰（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民國時期幾位被遺忘的經學家〉	葉國良（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儀禮》各禮典之主要禮意與執禮時之三項基本禮意〉
張壽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傳統經學的知識擴張與典範轉移在清代〉	吳飛（北京大學哲學系）：〈現代學術中的喪服研究——以三部喪服學著作為中心〉

第二場

第一組	第二組
主持人：錢宗武（揚州大學文學院）	主持人：葉國良（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陳雄根（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中文系）：〈「孟子深於《易》」論〉	單周堯（香港能仁書院中文系）：〈香港大學「《春秋》《左傳》學」研究述要補〉
何志華（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荀子》述《孟》考：兼論〈性惡篇〉相關問題〉	許子濱（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左傳》「請安」及相關紀事考釋〉

第三場

第一組	第二組
主持人：鄧國光（澳門大學中文系）	主持人：何志華（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
錢宗武（揚州大學文學院）：〈論韓國《書》學文獻文本狀態及其校勘原則〉	徐興無（南京大學文學院）：〈釋「詩者天地之心」〉
蔣秋華（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章太炎《尚書》著述考〉	車行健（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論朱熹的《詩序》觀——朱熹《詩集傳》與《詩序辨說》詩說異同比較〉
陳遠止（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經學傳承：《書經》之中外詮釋〉	張錦少（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論清人三家《詩》分類理論中的「師承法」——以劉向及《說苑》為例〉

第四場

第一組	第二組
主持人：單周堯（香港能仁書院中文系）	主持人：徐興無（南京大學文學院）
彭林（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清華簡《耆夜》酬酒、作歌考辨〉	鄧國光（澳門大學中文系）：〈唐文治先生《論語大義》義理體統探要〉
劉文強（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申公臣靈王（二）——「遇於柎隧」〉	李雄溪（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劉師培《毛詩札記》評陳奐《詩毛氏傳疏》小識〉
鄧佩玲（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周頌·大武樂章》重探——以清華簡《周公之琴舞》參證〉	許振興（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劉百閔的《經學通論》〉

第五場

第一組	第二組
主持人：陳雄根（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中文系）	主持人：盧鳴東（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
郜積意（福建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馬衡《漢石經集存·春秋經》殘字獻疑〉	朱岩（揚州大學文學院《尚書》研究中心）：〈《洪範》與漢代《書》學之讖緯化〉
孫劍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李威侃（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中心、實踐大學博雅學部）：〈《四庫全書總目》避諱改字考〉	馮曉庭（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新、舊五代史》載錄經學史料述略〉

鄭吉雄（香港教育學院語文教育中心）：〈《周易》經傳詮釋及閱讀方法——兼評榮格心理學詮釋〉	吳儀鳳（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民間信仰：經學的另一種傳承形式——以《太平廣記》中「舜神」材料為例〉
王鏐（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文獻與信息學系）：〈阮刻本《禮記注疏校勘記》質疑——以〈禮運〉篇為例〉	
方向東（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阮刻十三經注疏版本源流關係考辨〉	

第六場

第一組	第二組
主持人：張壽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主持人：鄭吉雄（香港教育學院語文教育中心）
蔡長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皮錫瑞《詩》主諷論說探論〉	盧鳴東（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文化接受的身分認同：朝鮮朝文廟從祀的形成過程〉
郭鵬飛（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讀王引之《經義述聞·爾雅》札記二則〉	金培懿（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韓國經學發展之承繼與新變——以三國至高麗時代經學所作的考察〉
招祥麒（珠海書院中文系、培僑中學）：〈溫柔在誦：蘇文擢韻律誦研究〉	藤井倫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掌握朱子真義之讀書法——以山崎闇齋《文會筆錄》所作的考察〉

三、會議論文綜述

（一）經學歷史與發展研究

與會學者從宏觀探討經學歷史與發展的共六篇，研究從五代至清代、民國，亦論及香港、朝鮮與韓國的經學發展。林慶彰教授〈民國時期幾位被遺忘的經學家〉始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對「民國時期的經學研究」，林先生整理相關研究

的書目，發現民國經學的論著典籍有未被收錄、缺乏整理等嚴重情況。林慶彰教授開始編輯《民國時期經學圖書總目》、《民國時期經學叢書》與民國時期經學家的著作，發現不少經學家漸被遺忘，如曹元忠(1865-1923)、曹元弼(1867-1954)、羅倬漢(1898-1985)等。論文主要述說徐天璋(1852-1936)、戴禮(1882-1935)、張壽林(1907-?)與李源澄(1909-1958)四位經學家，逐一從生平事蹟、經學著作和後人研究成果三方面，整理四位前賢的經學淵源。林慶彰教授於結語指出，不少民國時期的經學仍被忽略，如：宋育仁(1858-1931)、曾運乾(1884-1945)、蔣伯潛(1892-1956)與馬宗霍(1897-1976)等。林先生文中論及的經學家，徐、戴、張、李四人，經文哲所整理相關學術資料，於學界漸受關注，而民國時期的經學研究亦將成為學術的焦點。

張壽安教授〈傳統經學的知識擴張與典範轉移在清代〉集中討論經數與經目的變化，查考經學的學術轉變意義，時間聚焦於清代中期的乾隆、嘉慶、道光時段，當時經數與經目的轉變最為劇烈。經數於不同年代每有增減，經目異同不一，張壽安教授梳理經數與經目的流變，探析箇中意義。張先生言「六經」最早見於《莊子·天運》，漢興時《樂經》已失傳，故東漢章帝(58-88)時《白虎通》只有《詩》、《書》、《禮》、《易》、《春秋》。漢代崇孝治、尊孔子(551-479 B.C.)，於《五經》以外兼習《考經》、《論語》，始言「七經」。「十三經」之名，顧炎武(1613-1682)言當立於明代，張壽安教授考據應當起於北宋年間。文中更舉數例詳加探究，如將沈濤(1792-1861)「十經」與段玉裁(1735-1815)「二十一經」之說並置研讀，從彼此師承的關係，了解沈濤將緯經重新收錄入經，可視作經學新源頭的開闢，而段玉裁兼收史書、小學書、算學書，可知段氏鑑於當時的學術發展，明白經學的知識範疇有擴闊的必要。張先生總括各家所言經數、經目不一，與經學正統和流派的分辨相關，同時因知識擴張、典範轉移造成對經的觀念有所轉變。馮曉庭教授〈《新、舊五代史》載錄經學史料述略〉以《新、舊五代史》所涵蓋的「五代十國時期」為研究核心，羅列當時經學的史料與研究者，分析帝王宗室參與經學活動的情況，了解政府援經論制與據經取士的模式，以窺探「五代十國時期經學」的面貌。

許振興教授〈劉百閔的《經學通論》〉先言劉百閔(1898-1969)教學經歷與生平著作，帶引出《經學通論》的編撰源起，兼述香港大學的經學教育。許先生點出《經學通論》從講義轉為著本的不同，並言此書以「人文科學」為本，具備經學

與中華民族文化結合的視野。盧鳴東教授〈文化接受的身分認同：朝鮮朝文廟從祀的形成過程〉言中國儒家文化傳入朝鮮半島，文廟制度的確立屬重要的印證。盧先生從文化傳播與身分認同方面，探討從祀者的身分與文化接受，述說儒家傳道系統的確立，了解學脈分流於域外產生的情況。金培懿教授〈韓國經學發展之承繼與新變——以三國至高麗時代經學所作的考察〉從三國與新羅統一時代、高麗王朝時代與朝鮮王朝時代，梳理古韓國經學的發展軌跡，通過比較當中之異同，了解各時代的經學特點。金先生認為朱子《四書章句集注》的讀書法，為古韓國「非漢」讀者提供有效解讀聖人道統語脈的學習方法，並引朱子所言「必將有以自得」中的「自得」，作為韓國經學研究主體性確立的標誌。

（二）《五經》研究

針對個別經典，與會學者的《五經》研究占很大比重，共十五篇。論及《尚書》、《詩經》稍多，各四篇；以禮學、《春秋》經傳為題者，各三篇；探析《周易》者一篇，下文按類逐一分述。

禮學方面，彭林教授〈清華簡《耆夜》酬酒、作歌考辨〉先言清華簡《耆夜》所述之事，不少地方牽涉禮制，彭先生認為時人雖不乏相關研究，但仍有可論之處。彭林教授謂《耆夜》「酬」字四見，學者多解作「飲酒」，彭先生以為不確，言周代飲酒以獻為單位，每獻分為三節，分別為獻、酢、酬。「酬」經典又作「醕」，意為「主人進客」，彭林教授言獻、酢、酬三節合為一體，行於周代，春秋亦然，並見於《詩經》、《左傳》。三節所指不一，酬具特定意義，為飲酢後與賓敬酒的專名，彭林教授據主人酬賓、獻公之禮，指《耆夜》記酬酒四處，僅一處合禮，其餘均有違於經典，由此引申多家分析，卻莫衷一是。文中另見彭林教授對《耆夜》「舍爵」、「主賓」、「作歌」等的分析，從梳理的資料引出時人論點與存在的疑問，當中難以通明的部分，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葉國良教授〈《儀禮》各禮典之主要禮意與執禮時之三項基本禮意〉指《儀禮》十四種禮典各具主要禮意，葉先生逐一梳理說明，如「士冠禮」為使冠者能體悟身處社會、家庭等不同責任，並需要循禮而行。又，「士相見禮」旨在以摯為象徵，向對方表示締造關係的誠意。另，「聘禮」的主要禮意在於維護兩國邦交的和睦。葉國良教授言禮典的禮意極為明確，但於執行儀節時，須以基本禮意支撐，葉先生歸納出恭敬、肅靜與潔淨，引例詳述三點基本禮意。葉先生提到恭敬，指具

體執禮時對人與事心存敬意，如〈聘禮〉記載使者與眾介，從受命到入居使館，經過四次的展幣檢視，正是對幣聘之事心存敬意。肅靜方面，葉國良教授認為，是於行禮過程中，尊重他人發言，避免影響儀節進行，葉先生徵引〈士喪禮〉指喪禮上若要舉行重要儀節，須暫停哭踊之事，維持肅靜，確保禮典的順利進行。葉國良教授談到潔淨亦為敬的一端，不淨則無以敬，並言儀節中凡與飲食相關，必設盥手的壘、洗或匱、盤，以及防塵的蓋幕，如〈燕禮〉、〈公食大夫禮〉與〈特牲饋食禮〉等。葉先生總結，肅靜、潔淨均以恭敬為本，肅靜、潔淨形於外，恭敬蘊於內，內外相合，誠意則顯，基本禮意既存，各禮典的主要禮意亦得以彰顯無遺。王鏞教授〈阮刻本《禮記注疏校勘記》質疑——以〈禮運〉篇為例〉比對阮刻本與「元代翻刻元明遞修本」的《禮記注疏》，指阮元(1764-1849)《禮記注疏校勘記》所言闕文，主要源於元十行本的墨釘與闕頁。王先生以〈禮運〉等篇為例，舉證指出元十行本的墨釘與闕頁，可能據翻刻之宋十行本。

《春秋》經傳方面，單周堯教授〈香港大學「《春秋》《左傳》學」研究述要補〉承刊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之「香港大學《左傳》學研究述要」講稿，補述香港大學研究「《春秋》《左傳》學」的成果。單文補述資料共十篇，九篇為單先生所著，分別為〈論章炳麟《春秋左傳讀》時或求諸過深〉、〈《春秋左傳讀敘錄》之評價問題〉、〈錢鍾書《管錐編》杜預〈春秋序〉札記管窺〉、〈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五情說補識〉、〈論《春秋》「五情」——兼論「五情」與詩學之關係〉、〈竹添光鴻《左氏會箋》論五情說管窺〉、〈「五情」之相關問題〉、〈《高本漢左傳注釋》孔疏杜注異義考辨〉與〈《左傳》新注小學補芻議〉，一篇為招祥麒校長〈王夫之《春秋稗疏》研究〉，以下僅略述二例。單周堯教授於〈《春秋左傳讀敘錄》之評價問題〉，先引諸祖耿(1899-1989)〈記本師章公自述治學之功夫及志向〉中章太炎(1869-1936)的說話，記俞樾(1821-1906)評《春秋左傳讀敘錄》為「穿鑿」。單先生舉例證五則，指《春秋左傳讀敘錄》所言大抵合乎情理，並懷疑諸祖耿將章太炎的《春秋左傳讀》與《春秋左傳讀敘錄》混淆。單周堯教授述〈王夫之《春秋稗疏》研究〉，言招祥麒考釋詳備，逐一細研《春秋稗疏》條目共一百二十二條，並指出招先生之貢獻。招祥麒統計《春秋稗疏》考地理者占全書 58.2%，而非《四庫提要》所指「十居其九」。另，招先生認為《春秋稗疏》為王夫之早年所作，其後加以訂補，文中亦點出《春秋稗疏》的優缺之處。

許子濱教授〈《左傳》「請安」及相關紀事考釋〉集中討論《左傳》昭公二十七

年，研究昭公於冬天由鄆往齊的事，分析當中「請安」與整段紀事的含意。許先生綜合文字、語法、敘事、禮制四處考據，指《左傳》僅言「使宰獻，而請安」及「請使重見」，突顯景公的輕慢無禮，省略無關宏旨的小節小事。郟積意教授〈馬衡《漢石經集存·春秋經》殘字獻疑〉從殘字誤釋、誤釋表裏、誤判行款等方面，引例分析《漢石經集存·春秋》中的可商之處，另討論碑石行字的特例與補刻的情況。

《尚書》方面，蔣秋華教授撰寫〈章太炎《尚書》著述考〉緣於對《太炎先生尚書說》的好奇，欲探究書中收錄那些資料，了解著作編輯成書的過程，兼論章太炎其他研究《尚書》的專著。《太炎先生尚書說》為章太炎講述、諸祖耿所整理，蔣先生探究諸祖耿生平，提到諸氏為章太炎弟子，有記錄章氏講學的習慣，亦特別留意《尚書》的講議。一九三六年章太炎逝世後，諸祖耿整理書稿，定名為《章氏尚書學》，因出版機緣與訂數太少等問題，輾轉延至二〇一三年才得以出版面世。諸祖耿自言編纂的《太炎先生尚書說》，或有編次與重複的疏忽，卻自信沒有遺漏。蔣秋華教授考據章太炎研究《尚書》的前因後果，徵引章氏《太史公古文尚書說》與《古文尚書拾遺》的資料，總論諸祖耿整理的《太炎先生尚書說》，將章太炎說解《尚書》的資料集於一處，但仍有許多相關書信未有收錄，令該書未能完整。

錢宗武教授於〈論韓國《書》學文獻的文本狀態及其校勘原則〉帶出如韓國、朝鮮、日本等中國周邊地區的古文獻，多為漢文獻，有歷代中土傳入的，與異域學者以漢語寫成的。錢先生指這類異域本土學者寫成的漢文獻特點頗多，為傳統校勘學與文獻學增添新的研究內容與整理方法。相關古籍的文本狀態，錢宗武教授以《洪範羽翼》、《尚書古訓》等著本影印為例，指出韓國《尚書》學的文獻不僅存在古籍常見的錯誤，亦見字體潦草、引文隨意、體例混亂的問題，為校勘工作增添阻礙。針對古籍的校勘，錢先生認為原則有三：存真為要、改則必精、利於研讀，依此有助推動《書經》於域外傳播的研究。

陳遠止教授於〈經學傳承：《書經》之中外詮釋〉言《史記·五帝本紀》引述《尚書·堯典》的方式不一，並通過比對，指〈五帝本紀〉中部分以漢代言語改寫原文，為求易解，以今語易古語，有助經學傳承。陳先生認為海外漢學學者，仍難以踰越中西文化的隔閡，並以高本漢的《書經注釋》為例，從中國古代歷史、社會制度、忌諱習俗與漢語詞彙方面，分析高本漢誤釋之處。朱岩教授〈〈洪範〉與漢

代《書》學之讖緯化〉指《尚書》學的讖緯化與〈洪範〉篇有密切關係，朱先生分析〈洪範〉「庶徵」之說最早與「災異」之論相關，指「憑書說災異」成為今文《尚書》學的讖緯風尚，並言讖緯化為漢代《尚書》學的最大特性。

《詩經》方面，李雄溪教授〈劉師培《毛詩札記》評陳奐《詩毛氏傳疏》小識〉抽取《毛詩札記》中評《詩毛氏傳疏》共十三條，逐一分析劉師培(1884-1919)的議論。李先生指劉師培對陳奐(1786-1963)誤釋《傳》旨與《詩》義之處，大多言之成理，而《詩毛氏傳疏》雖有缺失，陳奐具疏通《傳》意之功，故仍為不朽之作。蔡長林教授〈皮錫瑞《詩》主諷論說探論〉梳理論《詩》學者的觀點，言《毛詩》、三家對《詩》旨的理解均屬政治語言，而官方的今文《詩》學立場以三百篇當成諫書。蔡先生探皮錫瑞(1850-1908)對〈關雎〉之說，指皮氏言《詩》之為刺，屬溫柔敦厚的諷諭。

張錦少教授〈論清人三家《詩》分類理論中的「師承法」——以劉向及《說苑》為例〉先以劉向(77-6 B.C.)為例，論三家《詩》分類理論中的「師承法」，指漢儒治經專守一家之說不可信，由此衍生的「師承法」亦須重新檢討。另，張先生通過比對，指《說苑》言《詩》的文字部分因襲自《韓詩外傳》，不少言《詩》以外的內容亦互見於其他典籍，來源複雜，不應一概而論。車行健教授〈論朱熹的《詩序》觀——朱熹《詩集傳》與《詩序辨說》詩說異同比較〉以朱熹(1130-1200)《詩集傳》與《詩序辨說》為核心，探討兩書對《詩序》的依違關係與具體觀點。車教授指朱熹同於《詩序》，承襲《詩序》所建立的詮釋模式，相異之處在於朱熹於文詞表達、思想義理與詮釋方法上嘗試脫離《詩序》。

《周易》方面，鄭吉雄教授〈《周易》經傳詮釋及閱讀方法——兼評榮格心理學詮釋〉先從歐州詮釋學的背景切入，說明東西方詮釋學的不同，進而探討榮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以心理學分析《周易》的理論框架與限制。鄭先生提到「經」與「傳」之間存在「詮釋之環」，連帶論及《易傳》的生死哲學，指其源於《周易》經文的「陰、陽」與「初、終」的觀念。鄭吉雄教授另通過「抽象」與「具象」兩方面，重新反思《周易》卦爻辭的閱讀方法。

(三) 其他經典研究

於《五經》研究以外，其他經典的研究共占十四篇，論題遍及《孟子》、《論語》、《爾雅》、《四庫全書總目》、詩歌等範疇。前賢對孟子(372-289 B.C.)是否深

於《易》的說法兩極，陳雄根教授〈孟子深於《易》論〉針對該問題，分條探求《孟子》於文理中闡發《易》理之處，如「義與利」一條，陳先生引《孟子·梁惠王上》對義利之論，並引朱熹《孟子集注》，指出循天理自無不利之理。陳雄根教授以《周易》〈乾〉卦相對應，引〈乾文言〉孔《疏》言君子利萬物，則合於義，為法天之「利」。陳先生推論孟子處戰國亂世，仁義盡失，故重義而略利，孟子曉仁義者循天理，物得其適，乃法天之「利」，雖不言行，而利自見。陳雄根教授舉列二十條分述《孟子》與《易》之關係，內容涵蓋與民同樂、仁者樂天、性善說等孟子的主要學說，孟子闡發《易》理之言，能證焦循「孟子深於《易》」的說法不誤。

何志華教授〈《荀子》述《孟》考：兼論〈性惡篇〉相關問題〉從荀卿(313-238 B.C.)倡性惡與孟軻言性善之論開展，何先生言對荀卿詆孟軻仍感不解，並說《荀子·非十二子》詆孟軻之論有不少可商之處。另，學者如韋政通(1927-)、徐復觀(1904-1982)認為荀卿對《孟子》缺乏理解，亦指〈性惡篇〉所述孟子之意「盡屬誤解」。何志華教授針對相關問題，對讀《孟子》、《荀子》，從表述方法、文辭義理與字詞用語等方面，分析兩書相合之處，並探析《荀子·性惡篇》誤解《孟子》人性論一說。何先生經比對分析，指《孟》、《荀》於義理、措詞、比喻之處多見相合，證韋政通、徐復觀指荀卿平生未見《孟子》而據傳聞論《孟子》一說，兩說均可商榷。何志華教授更舉書證，論〈性惡篇〉出於荀門後學而非荀卿所作，故篇中詆孟軻之論，屬荀門後學針對《孟子外書·性善》而發，未必為荀卿所為。

鄧國光教授〈唐文治先生《論語大義》義理體統探要〉分析唐文治(1865-1954)《論語大義》中共二十篇大義，逐一點出當中的關鍵與深意。鄧先生言大義包含經濟、義理、考據與辭章等面向，開展儒家經學的體統，為二十世紀《論語》學中的重要著作。方向東教授〈阮刻十三經注疏版本源流關係考辨〉以阮元校刻的《十三經注疏》為中心，考其版本源流，釐清傳世版本之間的關係。方先生經校勘指世界書局本與道光本、南昌府本一脈相承，言點石齋本源於江西書局本，曾經校正，為阮刻以來錯誤最少的本子。劉文強教授〈申公臣靈王(二)——「遇於柎隧」〉集中討論《上博簡》〈申公臣靈王〉中的首句「戢於柎隧」，劉先生考據音義，認為當中「戢」字實為「晤」，而「晤」與「遇」通，連接後文「於」較合文法，故「戢於」應釋作「遇於」，整句該為「遇於柎隧」。

鄧佩玲教授〈《周頌·大武樂章》重探——以清華簡〈周公之琴舞〉參證〉以

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為證，探析〈周頌·大武樂章〉中樂章的計量單位、樂舞的創作年代與樂章的結構。鄧佩玲教授於總論指出，〈大武〉中作為音樂單位的「成」、「終」雖有混用之例，但二詞應有所區別。鄧先生亦言〈大武〉所載「六成」應包含詩篇六首。徐興無教授〈釋「詩者天地之心」〉以「詩者天地之心」為討論中心，考其出處、解釋與此說對中國後世文學的影響。徐先生言「詩者天地之心」始見於齊詩與《詩緯》。「天地之心」與天文星象相關，於兩漢以降，漸用於政治、學術、宗教等範疇，至劉勰 (ca. 465-532)《文心雕龍》作「道心」之意，建構出「文心」的觀念。孫劍秋教授、李威侃教授〈《四庫全書總目》避諱改字考〉從改字、缺筆、變體方面探討《四庫全書總目》的避諱之處，牽涉廟號、年號、姓、名、官銜等形式。孫先生與李先生指出，避諱改字為《四庫全書總目》帶來失誤失實的不良影響，由此衍生出對典籍的危害，有礙學風的走向。

吳飛教授〈現代學術中的喪服研究——以三部喪服學著作為中心〉，從喪服形制、義例禮意、理論詮釋考究丁凌華 (1952-) 的《五服制度與傳統法律》、程奇立 (筆名丁鼎, 1955-) 的《〈儀禮·喪服〉考論》，以及林素英 (1955-) 的《喪服制度的文化意義》。於理論詮釋方面，吳先生總括三位學者的特點：丁凌華的比較與歷史視野，程奇立的理論完整和宏闊，林素英的解釋細膩和審慎。郭鵬飛教授〈讀王引之《經義述聞·爾雅》札記二則〉以王引之 (1766-1834)《經義述聞》為探討對象，論〈爾雅上〉「業，敘也」與「揚，續也」兩條，爰引例證，分析當中可商之處。招祥麒校長〈溫柔在誦：蘇文擢韻律誦研究〉言吟誦古已有之，多用於詩文的教與學，於古代深具地位，並引例指《周禮》、《論語》中均有記載吟誦，漢代更以諷誦作出仕當官的考核。招先生述清代桐城古文家仍重視聲音與文學的關係，當中吳汝綸 (1840-1903) 將吟誦之法授予唐文治，蘇文擢 (1921-1997) 師承於唐文治，繼承吟誦的源流。藤井倫明教授〈掌握朱子真義之讀書法——以山崎闇齋《文會筆錄》所作的考察〉探析《文會筆錄》的版本與內容，指出山崎闇齋 (1618-1682) 研究朱子學的方法與特色。藤井先生言山崎闇齋對朱子思想的研究客觀、先進，另從山崎闇齋閱書數量之多與範疇之廣，可見其朱子學不僅注重「居敬」，「窮理」工夫亦徹底、傑出。吳儀鳳教授〈民間信仰：經學的另一種傳承形式——以《太平廣記》中「舜神」材料為例〉則為經學的傳承帶來另一種角度。

四、結 語

嶺南大學中文系先後兩次舉辦國際經學會議，承蒙各方學者支持，合得文章八十二篇，論題廣泛，探析深入，引發香港學界多番研究與討論。嶺南大學中文系致力於經學的「傳承與開拓」，承前人之淵學，拓後續的方向，期待日後舉辦第三次國際經學會議，延續經學研究之風。